

新道路上的荊棘

——李怡的《現代性：批判的批判》讀後

◎ 火源

李怡：《現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在大量論述現代性的著作裏，李怡這本算是比較奇特的。我指的是，他的立意本旨並不在現代性本身，而是通過辨析現代性內含的各觀念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失誤，藉以總結經驗，想要矯正中國現代文學界的不良風氣。論點集中表達了學術界積蓄已久的心願，所以並不追求驚人，獨特價值在於從全球化視野上立論，代本土中心的觀點立言。作者雄心極大，不僅用他委婉的筆調表示對流弊的不滿，也有對歷史的回顧，同時還建設性地提出了自己對未來的設想。

大量的精彩之論自不必說了，這裏只對他的觀點作些獻疑和補充。我覺得有兩個問題可能會產生誤解，值得稍作討論：一是強調感性；二是強調中國。兩種偏向當然不是作者的本意，不過因為他開的是藥方，所以不得不加大劑量；但如果不加辨正，或許會跨到錯誤的一邊去。俗話說，是藥三分毒，何況是很可口的「藥」呢。

作者多次提到「個人體驗」。他把現代性「更多地視作中國作家表達自身現代生活的複雜體驗的彙集」（本書第19頁）這個觀念是有識之士早就呼籲的，不僅是王富仁，楊義等老一輩研究者的希望，就是吳曉東，張旭東，高遠東，王岳川等新銳也都有這種認識。作者說：

問題在於我們的批評家應當意識到，無論自己熟稔多少的思想文化「背景」，都不能用來取代你面對一個生動的文本時的實際感受，能夠真正支持著我們批評話語的並不是那些清晰的理性邏輯和陌生的概念，作為批評者，我們只能緊緊抓住我們自己的閱讀感受，因為只有通過我們自己心靈的體察，才有可能與作家真實的感受方式與心靈運動溝通起來。（本書第52頁）

要求在研究中顧及到對象的豐富性和矛盾性，要求對矛盾性加以解釋，不是僅僅相信理論觀點的宣傳和作家的口號和主張，還應該注意他們的寫作實際，這些都是合理的，面對文學尤其應該如此。我們在一個批評理論興盛的時代，中國也跟著沾染了迷信理論的病症，看看學生的論文就知道中毒之深：故作高深，充滿大量還沒搞清的名詞術語，閱者也如墜霧中，只好自認無知了事。致使理論名詞滿天飛，卻既不符合理論原義，又脫離了研究的對象。作者提出質問：「新穎的的確也是頭頭是道的『文學文本』之外的分析，究竟在多大的意義上反過來符合了我們對於文學文本的基本感受」（本書第41頁）？從這個角度看，作者的提法對療治這種理論崇拜症還是有針對性的。

但是它的可操作性卻值得懷疑。作者也說：「文學闡釋是我們盡力對於複雜的文學感受的理性說明」（本書第32頁）。但是對作品的認識僅僅是從感性直接到達理性的嗎？高級的感知本來就不是純粹的，都要受制于抽象認識（理論）的指導。理論使我們看到一些日常看不到的東西，它對批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讓批評家不帶著理念積極地向文本內部衝擊，以求心靈的交融，而是僅僅閉目憑感覺的神會，我想批評家的理性職責恐怕無法實現。創作都受到理論的引導，批評倒可以不顧嗎？

我們研究界的問題不在理論本身，而在于對理論運用的工拙。這個弊端的治理絕不是靠回到感覺體驗就能濟事的。如果批評家真的都只去挖掘被忽視的文學現象，而那些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我怕到頭來還是沒有收益，倒是使得文學史失去史識的支撐，變得龐大無邊而成為彙編性的東西；中國文論也還是要繼續「失語」下去的。

我們對理論的厭煩，一方面是因為理論的使用不當，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我們對理論有過分的崇拜，而理論又總是欺騙我們，令我們失望，于是我們因愛成恨。其實我們對新理論的態度是實用性的，還是最淺薄的那種，缺乏認真負責的精神。每當引進一種新理論，就像見到一根肉骨頭，大家都會蜂擁而上，又不肯使用牙齒，只是在上面忘情地舔舐，很快因為沒什麼滋味，便棄它而去，結果使真正肯用功的誠實人不好下口。除了擺正態度，我們還應該改變認識：不要以為理論可以一勞永逸的產生，我們似乎只認為有一個真理，我們忽視了事物多方面的豐富性。理論可以使我們看到一些看不到的東西，自然也會遮蔽一些東西，但無論如何可以從多側面讓我們瞭解對象；理論不是觀點，而是方法，是分析問題的角度和視野。可以說理論既是研究的結果，又是研究的開始。不應該簡單化，而應該具有彈性。從這個方面講，作者強調「體驗」，對糾正理論崇拜的確是有益的。

作者流露出的那一點反理論的傾向，源于糾弊的動機。他自己並不忽視理論的意義，他說的體驗，其目的正在于「理性說明」；他也並沒有拒斥「現代性」這個理論。但是在如何將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這方面，講得不足。如果貿然把「體驗」作為研究絕對的起點，我怕這個「『新』的現代學術思路」（本書第160頁）會由于不能認清弊端的根源，使得後面的道路充滿荊棘，也許還將不得不返回原點。

作者在「個體經驗」之外，還尤其強調中國文學研究中「中國經驗」的重要性。作者以「空間」和「時間」對立來表述中國經驗和西方現代性經驗的對立。他說：

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空間」體驗基點相適應，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每一次真正的創新，其實並不來自于時間意義的新潮理論的輸入，而恰恰是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返回「原點」，努力進入更多的中國現代作家的「體驗空間」，去認識和理解他們各種各樣的實際的人生感受。（本書第62頁）

從中國文學的現實出發，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和可能產生排斥理論的可能性一樣，強調中國立場也潛藏著回到封閉圈中的危險。

作者反感的是西方的理論霸權。這也難怪，從上個世紀初以來，中國文學研究中有多少是自己的創造呢，引進外國良規幾乎已經成為我們唯一的道路了。無怪乎有血性的研究者都不滿于中國文論的「失語」。如果想要出成果，提倡回到以中國為本位的研究，當然是毫無疑問地正確，但是我肯定這樣作的結果不是中國文論「發出聲音」，而是相反，所謂成果僅僅是局部性的。

其實作者只要說「研究要重視我們自己的研究對象」也就夠了，或者強調說：在「中國意識」之外，還必須保留，或者發展「全球視野」。這點作者一定是這樣認為的，本來沒必要多費唇舌，我的補充也不過如此。之所以要提出來，認為是偏向，是因為這種提法在此階段是出于一種欲求，就是中國本位的確立。這種欲求反應了一種封閉的心理——煌煌上國的舊夢還不斷浮現。從感情上講可以認同，但是從理智上講則令人擔心。以封閉的心態求中國的壯大，結果會怎樣？正是「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落實在文學研究這個領域，就是希望「中國文論發出聲音」，所謂「發出聲音」，指的是參與到國際學界，引起別人的注意。中國文學研究界的確存在迷信西方的問題，但是迷信不是對西方已經瞭解了，而正因為不瞭解。一直以來，中西之分實際上還是在心理上使得自己成為一個異類包圍著的世界，或者是一個世界包圍著的異類。

中國的特殊規律要找，但不會令我們的文論發出聲音。古代的文學「理論」，實際上是在幾乎封閉的圈子中形成，研究者不研究「中國」的問題，是不可想像的。但現在我們卻在一個業已開放的世界中，如果還是在舊的封閉圈子中，使得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大圈子之內的小圈子，雖然會有成果，但是重要性常常不大。希望在沒有與外界共同的話題和語境的情況下，通過閉門造車，產生的「理論」拿到世界論壇上去，無疑如把麻將拿到美國去賣。最終還會遇到1990年代初的那次「全球化與文化」會議上李澤厚遭遇的尷尬處境。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既要參與全球文化，又要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矛盾只有等到中國真正參與到世界的生活中去了，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到那時，中國的國際角色越來越重要，參與國際生活的程度越來越深，國際問題也會成為中國問題，這個時候中國問題就是會給國際增加新東西。如果沒有世界視野，所謂新，還是指對中國固有理論狀況是新的，而不是在世界範圍內的「新」。什麼時候因為外國有了，就不再開口和不再拼命鼓吹（當然不是由于無知，而是因為確實知道了），接觸到別國新的理論，卻加以發展和補充，甚至批判，把外國的理論作為理論背景來提出自己的理論，什麼時候才能說我們的「理論」是有世界意義的。

當然，這不是文學本身的運動能夠起作用的。作為文學研究者，重要的是處理好理論的前瞻性和現實性的結合問題。作者也不否認西方文論的引進的意義，不過他講的是「中國化」，他指出：

所謂「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藝創作的良性互動關係應該這樣的：是中國文藝創作的豐富經驗提示著中國文論家思考的方向，又是西方文論的豐富內涵充實著我們的思考方式；中國文藝創作自然「需要」著西方文論，而西方文論的話語也在解釋中國文藝創作現象的時候自然瀰漫開來——當西方文論的意念不是以雄霸一方的姿態出現而是作為對於中國文學實際問題的有效解決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說是成功實現了西方文論的中國轉化。（本書第174頁）

雖這是作者指出的美好方向，但是在這種實用的態度影響下，如何能有理論的飛升呢？不過，作者既是針對流弊，也就不作苛求了。作者強調中國文論的自主性，但是對在所謂全球化趨勢中，中國文論如何走向世界的一體化方面還是論述不夠。

以上兩點有助于我們認識到，作者立論的出發點。我們注意到，作者的觀點屬於全球化悖論的產物，也染上了全球化悖論的痕跡。本來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就存在著經濟本土化的趨勢，在文化一體化趨勢的同時，到處是抵抗的民族文化復興的訴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因為在西方中心受到後現代主義的質疑以後，西方理論因為中心破裂而失去普遍性，一次集體的

理論叛亂開始了，原來邊緣的個性受到更大重視。作者的這種訴求就是本土化的體現。實際上作者的觀點和他質疑的後現代主義有著相同的現實背景和觀點融合。他的本土性和後現代的「中華性」多少是相通的，不過前者顯得低調穩重一些，後者強調並肯定它的反抗性罷了。可見作者的理論流脈，屬於後現代之後，是對後現代主義視點的調整。也從而可以理解他的這個特點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當前中國「理論熱消退」的表現之一。

對於如何在強調本土化的同時融入全球化，他沒能給出答案。目前有關全球化下的文化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成果的討論，在這個基礎上參照經濟全球化的模式，討論文化思想問題還是很困難的。表面上可以期許地方性文化豐富全球化，以自身的文化入股，但是實際上這種矛盾很難真正解決。一涉及文化問題，一體化就不是那樣不證自明的了。特別是文化問題並不像經濟那樣可以合作，內在矛盾要複雜得多。他的理論困難也正在此。

他反覆申說中國的現代性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可是僅僅獨特性就夠了嗎？沒有先進性和合理性行嗎？小腳，辮子本來是很獨特的，有它們恐怕不行，到頭來卻發現，引起「轟動」不過是因為新奇而成為別人看的對象。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學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了，帶著世界文學的性質。現代文學的現代性不被看作外國影響的結果，是不行的。特別是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受到外國理論的衝擊，很多時候不過是對外國作品的模仿，真正有創造性的作家究竟有多少？現代文學產生很多變異和自己的特點。如果認為中國所具的「現代性」是西方現代性的輸入和融化過程中產生的變異，那麼除了西方現代性還有什麼可以作為這種變異的動因？現代性的變異的獨特性固然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說到找規律，大概僅能得到：輸入的現代性怎樣受到抵抗的經驗。對象是現代性還是非現代性呢？又何必現代性？失去他國的參照，失去了輸入的「現代性」，現代性不過是差異性的另一種叫法，于是也就取消了現代性的統一性。那麼作者認同的「現代性」概念就受到了一次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的抵抗，或者說一次嘲弄。

用化解了的「現代性」，來研究現代性為「核心」的現代文學，是一種悖論吧。我相信，按照作者的視角重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可能的，它會涵容更多被忽視的文學人物和文學現象。應該稱為「現代性變異文學史」。

火 源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七期 2006年12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七期（2006年12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